

引文格式: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与问题域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 (1): 89-97.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与问题域

罗迪江

摘要: 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成为理解绿色翻译的出发点, 生存思维、生命思维与生态思维构成了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 而“为何绿”“能否绿”“如何绿”成为绿色翻译之“绿色之问”的问题域。基于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与问题域, 绿色翻译是一种“人-文-境”和谐共存的生态翻译。具体而言, 绿色翻译是译者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方式为导向, 以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诞生、延续与成长为任务的一项践行绿色理念的文本移植活动。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绿色翻译; 生态思维; 翻译生态; 和谐共生

作者简介: 罗迪江,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18BYY0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地区项目“译者中心理论体系建构的生态理性研究”(19XJA740004);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译论研究的中国叙事: 生态翻译学构成性特征及其学术定位研究”(21NDJC190YB)。

中图分类号: H059; X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1.10

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中, 语言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一直处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却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触的状态。一方面, 语言翻译观把翻译视作两种语言或文本之间的对等转换。那么, 在翻译研究中,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与诠释繁杂多样的翻译现象呢?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 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对翻译复杂性的理解逐步深入, 早已不再把翻译视为孤立的语言转换行为, 而是充分意识到文本内外诸多要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与影响^[1]。另一方面, 文化翻译观在试图破除语言或文本对翻译限制的同时, 却潜在地将具有主体创造性的译者置于翻译的主宰与操纵之地位, 自然而然地陷入译者中心主义的泥潭。文化翻译观确实“强调了主体性的作用, 但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将抽象的齐一性的主体变成了只有差异性、情感性、非理性、意志性的单子主体, 它有绝对的自由而没有任何束缚, 忘记了人们作为主体, 一方面既有其主动性, 也有受动性, 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 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存在物这一基本事实”^[2]。译者与文本的二元对立被视为这两大根本“转向”共同的症结所在。如何为译者与文本寻求共同的理论框架以促使彼此之间视域融合, 从而提供一个非二元论的思考空间, 是近年来译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21世纪初生态翻译学的发展, 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思与审视逐渐确立了一种“生存-生命-生态”复杂性思维范式。这种复杂性思维范式揭示了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互动性与整体性, 进而形成了明显的以“生”为导向的绿色翻译。“绿色翻译是在以‘生’为内核的共生共在状态下展开绿色行为, 以和谐有序的形式发展绿色方式,

既试图克服语言翻译观对译者主体性的遮蔽,又尝试克制文化翻译观对译者主体性的极度彰显。它是对传统翻译观对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关系遮蔽的反驳与匡正,展现了自身独特的共在性、共生性、和谐性。”^[3]这使得关于绿色翻译本质和内涵的探讨更为细致和全面,体现了绿色翻译的多重意蕴;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绿色视角,拓展了绿色翻译的诠释途径和方法。

一、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具有生态分析特征的整体性方法论,逐渐渗透于翻译现象的生态解释模式之中,成为后现代翻译学领域中极其重要的研究方向。事实上,生态翻译学的提出,并不是否定语言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而是对语言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的拓展与延伸;它不仅是对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及其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认识,而且为语言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的相互融合提供了新的对话平台。“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学视角为翻译研究寻找一个相对可靠基础的元科学,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视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翻译研究范式。”^[4]在此意义上,生态翻译学以生态范式的视角对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进行整体性探讨,形成了解释与说明翻译现象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翻译不再只是一个与文本相关联的概念,而是被包括进以生存、生命、生态为导向整合而成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之中。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来看,生态翻译学蕴含着一种以生存、生命、生态为内核的绿色翻译,并表现出明显的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等生态特征。进而言之,绿色翻译正是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绿色理念、绿色价值与绿色行为的指引与导向。

(一) 绿色翻译的生存思维

语言翻译观的实质是确定了文本与无限理性的核心地位。文本作为探讨翻译的出发点,确立了文本的认知思维方式,它必然以文本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分离与对立为特征。由于追求文本的确定性,认知思维方式在起点上就会造成译者与文本之间形成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译者在其生存方式上处于隐身的状态。绿色翻译的提出,一方面为反思与批评译者隐身提供了前提基础,另一方面则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并强化了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了译者的生存思维。从生存论的视角看,绿色翻译与译者的生存境遇和文本生命状态、翻译的生态整体是内在关联的。绿色翻译区别于传统翻译的最大特征在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共生性和谐。就此而言,翻译活动不仅涉及翻译如何存在,还关联着译者如何生存以及文本生命如何生成,而翻译的任务就是肯定“译者是存在的翻译存在的尺度”^[5],揭示译者生存与翻译存在、文本生命之间的内在关联^[5]。传统翻译以内在于文本的单一方式,规定了翻译活动的语言转换过程;绿色翻译则侧重于探讨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关系,进而表明以生存、生命、生态为导向的整体方式更具有解释力。

译者生存属于生存论的范畴,展现了译者对自身生存身份的寻找与确定。“译者总是栖居于翻译生态环境,其出现是某个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并随着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这是译者安身立命的方式。”^[6]在译者生存的基础上,译者与自身的存在以及译者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交互才有可能发生,才能形成生态翻译学意义上的绿色翻译。绿色翻译既是译者存在的方式,也是绿色行为方式的根本动力。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生存,总是以不同的绿色行为方式展现自

身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的展现，不仅蕴含着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更意味着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生态责任与绿色意识。这样，译者生存思维不仅摆脱了文本至上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维使译者自我突破了译者中心主义的限制，超越了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对立，弥合了译者主体与译者责任之间的裂缝，而且使译者主体在其绿色行为与生存活动中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与本质规定性：译者的自我性变成了融合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中的“在世的存在”；译者作为语言“转换者”变成了具有生态智慧与绿色意识的“生态人”而指向绿色理念的生存状态；物本化、隐身的译者变成了人本化、显形的译者；单一的译者主体结构变成了具有译者主导、译者责任、译者发展三重本质规定的“在场”的存在结构。译者不再是单一性的主体，而是作为一个“生态人”的适应性主体，并以绿色翻译行为方式为生存方式，把原文与译文、译者与文本、译者主体与翻译客体等诸方面的对立统一起来，这就摆脱与避免了耽于纯文本推理的传统思维方式。因此，译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翻译之“本”，是栖居于翻译存在之中的主体，是居住于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最终在翻译存在与翻译活动中成为翻译生态的守护者与看家者^[7]。

（二）绿色翻译的生命思维

语言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是翻译研究的两大翻译观念，分别对应的是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它们提倡的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二元对立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本生命的诞生、延续与成长问题。这不仅不利于我们真正把握与实现翻译的价值、评价翻译的地位，不利于我们把握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创造性，也不利于我们深入地探讨翻译研究以及把握翻译发展的方向。随着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发展，文本生命作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与译者生存、翻译生态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的“共生”议题，从而促使生态翻译走向绿色翻译。此时，绿色翻译的问题是以文本生命为思维方式展现的，这是绿色翻译的典型特征：它开启了以生命思维去审视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诞生、延续与成长这一翻译新范式。

绿色翻译不同于传统翻译的一个新出发点是生命思维，其显著特征就是反对追求翻译的确定性、绝对性、无限性，试图发现以生命为导向的思维范式，以便把活生生的文本生命之流“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当然，绿色翻译是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拓展当前翻译观的观点，并将当前翻译观的语言性与文化性内嵌于文本生命，进而揭示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诞生、延续与成长。“在翻译中，译文源出于原文，与原文之间具有必然的血脉亲缘关系，这一翻译伦理所决定的事实表明，译文经历语言层面的‘脱胎换骨’，以新的形式，在新的时间和空间里呈现出作品新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一旦被翻译，作品就进入了新的生命历程，开启其‘来世的生命’。”^[8]相对于原文而言，译文的“生态是彻底的外在性，它时刻处于生成之中，不断地努力向生命之外的领域进发，并不断改变并超越它自身的存在限度”^[9]。在此意义上，生命思维不仅关注语言层面的转换，还要考察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在原文中适者生存，又是如何在异域中茁壮成长的。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翻译始终处在未完成的“未济”状态，生生不息，永无止境^[10]。这样，绿色翻译在生命思维的导向下就是要克服翻译的静态性与抽象性，克服功利主义的翻译观念，彰显文本的生命力度，以生命为导向践行翻译活动的绿色理念、绿色观念与绿色价值。可以说，绿色翻译就是从生命思维出发来揭示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诞生、延续与成长，它所聚焦的是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翻译生态如何和谐共生的问题，所关注的是文本如何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生生不息的问题。

（三）绿色翻译的生态思维

生态思维是基于生存思维与生命思维而生成的动态平衡之网，它兼容生存思维与生命思维的

综合特征,又形成对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认识,从而能更好地理解翻译现象得以存在和发展背后的生态特性和生态机制^[11]。以此为切入点,绿色翻译为翻译实践描绘了一种全新的绿色的生态图景,即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三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保证翻译实践活动建立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促使译者以生态为导向践行绿色理念、绿色价值与绿色行为的翻译观。绿色翻译的生态思维是针对翻译研究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提出的,聚焦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整体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翻译的眼光。以往人们总是从文本的角度看待翻译,而绿色翻译则从生态思维来审视翻译的绿色理念、绿色行为与绿色观点。可以说,绿色翻译的生态思维涵盖了生存思维与生命思维,它关注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因而看到了西方翻译研究仅仅重视文本的偏颇,试图以生态思维去矫正原文中心论与译文中心论,用生态思维来与文本视角相抗衡,并以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共生作为绿色翻译思维结构的内在依据。

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出发,分析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有可能以整体论的视角探寻出一条弥合译者与文本之间的沟壑的路径,建构成别具一格的绿色翻译观。绿色翻译无疑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新的路径,使目前翻译研究的思维方式在根基处发生了转换,人们不再执意去寻求关于翻译的确定性或语言转换的对等性的认识论解决方案,而是致力于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来拓展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和谐共生的绿色视域。生存思维为绿色翻译提供了作为生态人的译者主体,生命思维为绿色翻译赋予了文本生生不息之态,生态思维为绿色翻译传递了绿色理念与绿色观念;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完整地呈现出绿色翻译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与思维结构,这是我们理解基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绿色翻译的首要论题。

二、绿色翻译的问题域

以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为切入点,“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作为翻译活动的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总是以译者生存(人)、文本生命(文)、翻译生态(境)之间的“和谐共生”为本质特征的。因此,“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是为了显现翻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翻译过程的整体性,显现翻译在“人-文-境”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和谐性,以及表明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翻译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是和谐共生这一根本性本质,为绿色翻译提供了深刻的复杂性认识。虽然翻译现象存在着高度的差异性,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整体关联与和谐共生,使绿色翻译处于一个整体统一的由人、文、境构成的翻译生态系统之中。这样,“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就成为一种具有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的思维范式,它是以“人-文-境”有机整体为本体信念,以绿色理念与绿色行为统一为价值观念,以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为基本思维方法的思考方式。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方式,我们对绿色翻译做如下理解:它是译者以“人-文-境”为翻译生态系统,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为导向,以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诞生、延续与成长为任务的一项践行绿色理念的文本移植活动。归根结底,绿色翻译就是一种以“人-文-境”为翻译生态系统来探讨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之间和谐关系的解释模式。我们知道,翻译实践活动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绿色翻译也必然是从特定问题出发的。对绿色翻译的说明

与理解还需要回到绿色翻译的问题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与诠释。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下，绿色翻译的“绿色之问”的问题域包含“为何绿”“能否绿”“如何绿”等三个方面问题。

（一）绿色翻译“为何绿”

绿色翻译“为何绿”问题，其实就是探究为什么绿色对于绿色翻译是重要的问题。就此意义而言，考察绿色翻译“为何绿”就直接成为追问绿色翻译的目的问题，而此问题正是绿色翻译当下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深入探讨绿色翻译概念需要回答的问题。绿色翻译之所以“绿”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践行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二是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与推进译者的和谐性生存。

其一，绿色翻译之所以“绿”在于践行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旨在践行绿色理念而“译有所为”。“绿色”是绿色翻译之所以为绿色翻译的独特生存方式，这一点从本质上把绿色翻译与传统翻译区别开来。作为生态翻译的具体化与实践化，绿色翻译所遵循的绿色理念与实践的生态范式，是在微观层面上、实践层面上回应胡庚申提出的现实性问题：如何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建构中国译论体系？怎样使译论研究体现人文学科对“绿色发展”的自然关怀和社会责任？^[12]在此意义上，绿色翻译的根本目的是基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之上反思翻译研究中“生态维度”的缺失，审视文化翻译观解释的局限性，扬弃翻译研究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考察东西方翻译理论的失衡，“通过对当代翻译研究发展趋势的把握，以生态翻译学现有研究为基础，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的突破点，以生态学为元学科的立足点，把翻译研究引入到全球性生态学术大趋势的轨道上，实现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并建构相应的生态范式”^[13]。当然，绿色翻译只是消解翻译研究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推进翻译研究走向整体论思维方式，进而在绿色理念、绿色行为、绿色方式的驱动下辩证地考察与审视语言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合理地处理翻译过程中共生性与异质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动态性与静态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更重要的是追求翻译的和谐性与共生性。这样，绿色翻译就是一个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它表现为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译者是绿色翻译的承担者，而文本与译境是译者的适应对象与建构对象；译境是绿色翻译的基础，决定着文本的生态位建构与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是绿色翻译的根源，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审视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生成性，追求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有机融合与和谐共生。

其二，绿色翻译之所以“绿”在于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推进译者的和谐性生存。西方翻译研究对译者的研究是围绕着译者的主体性展开的，并大致沿着“隐身者”——“显形者”、“转换者”——“操纵者”的路线进行的。沿着这个思路，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要么被遮蔽，要么被极度张扬，译者的本身自我处于异化状态。绿色翻译所反映的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将对译者异化状态进行生态塑造，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推进译者的和谐性生存，进而将译者塑造为翻译的“生态人”。基于“生态人”的身份，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践行翻译的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与绿色行为。作为“生态人”，译者能自觉尊重翻译群落、原文生态、译文生态与翻译生态环境，自觉地运用译者的生态智慧、生态责任与翻译伦理，实现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的和谐平衡^[14]。作为“生态人”，译者能合理地运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去理解翻译，通过有效地认识“人-文-境”之间的关系和正确地对待“人-文-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处理文本的生命形态与翻译的生态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根本上使得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因此，译者唯有成为翻译的生态人，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才能有效融合，绿色翻译才能作为一个有机体而存在。

(二) 绿色翻译“能否绿”

绿色翻译“能否绿”这一问题需要置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之下才能得到更好的诠释。绿色翻译的难点不在于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而在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和谐共生的彼此割裂。和谐共生意味着翻译要以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为导向促使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与有序。从翻译“共生”的角度来说,翻译“落地生根”于“异”而“开花结果”于“生”,翻译之“异”与“生”共同造就了翻译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整体性^[15]。因此,绿色翻译“能否绿”的关键是“和谐共生”理念的践行,而翻译之“生”与“异”共同生成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整体性构成了“能否绿”的显著特征。“和谐就在绿色中”,绿色翻译也是和谐翻译^[16]。这就意味着,只要在翻译实践活动中以“生存-生命-生态”为思维方式,使得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那么绿色翻译就能够变“绿”。

我们知道,译者作为适应性主体既要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又要通过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建构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使文本生命在新的异域中“适者生存”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在这种新的绿色思维方式下,翻译不再仅仅致力于纯粹的语言转换的对等性,而是以“和谐共生”为目标考察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生存境遇,以译者生存为阐释基底探究文本生命是如何诞生的,使文本生命在翻译生态环境中接受“适者生存”的考验,从而揭示文本生命的成长之旅。在这样的绿色翻译图景中,译者对于自身的生存境遇,对于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对于翻译实践活动的认识是全新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形成新的绿色化的翻译生态系统。正是翻译实践活动在译者生存境遇与翻译生态整体的耦合下融入了“和谐共生”理念,促使文本的“生命”之树在新的异域中“生生不息”,绽放出“绿色”之意。正是这一“和谐共生”的逻辑理据,文本“生命”之树与“绿色”之意的有机融合,使翻译变“绿”成为可能。概言之,“和谐共生”为翻译变“绿”提供了可能,进而实现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视域融合。

(三) 绿色翻译“如何绿”

绿色翻译“为何绿”“能否绿”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绿色翻译“如何绿”。我们知道,绿色翻译不是一种给定的、既定的行为,作为连接原文与译文的“中介手段”,它是在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关系互动中生成的绿色行为方式。由上论述可知,翻译变“绿”是译者主体在“和谐共生”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下,根据翻译生态环境进行生态适应与生态建构而实现文本生命在异域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获得新的生命。由于这个“适者生存”融入了文本新的生命力,所以绿色翻译不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融合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是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探讨文本生命的诞生、延续与成长。因此,绿色翻译充分描绘出翻译的绿色景观,给出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并构成了翻译生态系统有机存在的事实,用绿色翻译的方式去认识与理解翻译就成为翻译研究新思维范式的必然选择,其完全合乎绿色翻译本身蕴含的绿色意识与生态责任。那么,绿色翻译是如何变“绿”的呢?

其一,转变译者的身份。在具体的翻译行为中,译者不会以一种抽象、静态的身份出现,而会把抽象、静态的身份因素消融在具体的、动态的、与不同社会因素和环境密切互动的角色身份之中^[17]。因此,译者身份会因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绿色翻译的视域下,作为适应性主体的译者,需要从语言“转换者”、文化“操纵者”转变成翻译的“生态人”。译者作为“生态人”,是绿色翻译变“绿”的实践者与践行者。在绿色翻译的视域下,译者不再是语言翻译观的转换者,也不再是文化翻译观的操纵者、改写者与吞噬者,而是翻译的生态人、和谐人、适应者

与协调者。

译者作为“生态人”取代“转换者”“操纵者”是译者本质实现的突破性进展，是译者全面发展的结果，其现实表现就是“生态化生存”。它是超越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为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视绿色理念与绿色观念为翻译价值，实现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的共生性统一。因此，要解决翻译如何变“绿”的问题，作为“生态人”的译者需要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翻译素养与生态伦理素养。借此，译者能自觉尊重翻译群落、文本生态与翻译生态环境，自觉地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伦理规范、运用生态智慧、承担生态责任，实现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的和谐平衡。同时，译者需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促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来世生命。这就从译者身份改变的角度使得绿色翻译变“绿”成为现实可能，其意义就在于“扫除翻译环境中的共生障碍，维护良性共生翻译生态，创造优质共生条件，培养译者的理性共生翻译素质，剔除译者与翻译研究者的名利、欲望与偏见，使其共担翻译职责，共享翻译资源，共赴翻译使命，共建翻译平台，为有效服务翻译的学科发展与现实需求尽职尽责”^[18]。

其二，改变思维方式。这就是由传统翻译的二元对立的简单性思维范式转向“生存-生命-生态”复杂性思维范式。简单性思维范式强调语言转换的对等性，自然而然地将译者与文本、原文与译文割裂开来，否定了二者互生互存的辩证关系，致使翻译实践活动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泥潭。翻译活动历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人类活动，但是，对这种复杂性的学科却一直在用简单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所以，其结论往往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性^[19]。因此，要使绿色翻译变“绿”，必然要改变简单性思维范式，使之转变为复杂性思维范式，符合绿色翻译的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那么，绿色翻译的复杂性思维范式是什么呢？它就是“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

绿色翻译坚持“生存-生命-生态”复杂性思维范式，正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在共生关系，实现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生存-生命-生态”思维方式作为绿色翻译的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在建立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联系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方法论作用，它既是生态翻译发展的新形式，也是生态翻译的具体表现形式。它能够以和谐共生为导向驱动翻译实践植根于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能够对译者的生存状态、文本的生命状态、翻译的生态整体进行有效的视域融合，从而对生态翻译学语境中现有理论体系的概念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同时，这一过程伴随着思维范式的转换，正是思维范式的不断互动转换推动了绿色翻译变“绿”，进而推动了生态翻译的发展。

其三，关注文本生命。传统翻译研究往往局限于狭义的翻译过程来探讨“译本是如何产生的”或从既定的翻译结果来考察“译本是如何被接受的”等问题，往往缺乏对文本生命诞生、延续和成长的整个生成历程的关注与探寻^[20]。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翻译是“非绿色”的，既忽视了翻译的绿色性、生态性与动态性，又忽略了对文本生命的整个生成历程的考察与关注。因此，要使绿色翻译变“绿”，必然既要考察翻译的绿色性、生态性与动态性，又要考察文本生命的生成性与多样性。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下，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成为理解绿色翻译的出发点，而文本生命的生生不息是绿色翻译变“绿”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绿色翻译的视域下，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就是文本在异域中的“适者生存”，体现为文本对新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随着文本生命的生成、成长与发展延伸到时间和空间之中，从而增加了自身的差异性、多样性、生态性与复杂性。绿色翻译之“绿色”是既要使文本生命能够适者生存，又要使文本生命充满着差异性。翻译的缘起就在于一个“异”字，如果没有“异”，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性；“翻译本质就是要在异中求同，在同中存异”^[21]。就文本生命而言，

绿色翻译是以和谐共生视域来关注文本的生命状态,探讨译本“自我”的诞生、延续、成长是如何在“他者”异域中生生不息的^[22]。

三、结语

目前,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越来越受到译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作为生态翻译具体化的绿色翻译获得了生态翻译学“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与“人-文-境”共生体的印证,其生存、生命、生态思维结构和“为何绿”“能否绿”“如何绿”问题域也在改变着学者们对翻译的绿色认知与生态理解。从根本上说,绿色翻译的问题是确定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的和谐共生问题;从宽泛意义上说,绿色翻译的问题就是“对人来源于自然界、依赖于自然界的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事实性陈述,也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休戚与共关系的一种形象化阐释”^[23]。因而,坚持和谐共生理念,就是践行绿色翻译,就是对绿色翻译关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思维结构的内在把握,因为和谐共生就是“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特征表现形式,也是绿色翻译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绿色翻译具有较强的和谐共生性,其本质是在生态化与绿色化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可以说,绿色翻译的根本性质就是其思维结构和绿色问题的有机融合,即其生存思维、生命思维、生态思维的结构性统一和绿色翻译“为何绿”“能否绿”“如何绿”问题域的解答。正是从绿色翻译的思维结构和“绿色之问”问题域的综合作用中才产生出具有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的翻译实践活动。这样,基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绿色翻译,揭示了绿色翻译的多样性、整体性与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以往研究在思维范式方面的不足,提供了一个新的复杂性思维范式,这充分体现出绿色翻译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与认识论价值。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基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绿色翻译的生成机制尚须进一步挖掘,而阐释其生成机制则需要解释绿色翻译到底“有多绿”的问题及其“和谐共生”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基本问题。

参考文献:

- [1] 刘云虹,许钧. 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关于翻译本质的对谈 [J]. 中国外语, 2016, 13 (1): 95-100.
- [2] 吕俊,侯向群. 范式转换抑或视角转变: 与谢天振教授商榷 [J]. 中国翻译, 2010, 31 (1): 41-45.
- [3]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绿色翻译探析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 (4): 88-96.
- [4] 罗迪江. 当代翻译研究的机体主义建构: 翻译生命观的构想 [J]. 中国翻译, 2021, 42 (5): 15-24.
- [5] 罗迪江. 译者生存与翻译存在关系的生存论建构 [J]. 外文研究, 2021, 9 (1): 60-65.
- [6]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的作用与本质探析: 兼论对“译者中心”的质疑及回应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39 (6): 119-125.
- [7]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 兼论“译者中心”面临的质疑 [J]. 外语学刊, 2019 (1): 92-96.
- [8] 刘云虹. 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 49 (4): 608-618.
- [9] V. 莱姆. 尼采与生命政治学: 对作为生命政治思想家的尼采的四种解读 [J]. 郭伟峰,译. 世界哲学, 2019 (1): 80-95.
- [10] 陈东成. 从《周易》的阴阳之道看翻译的生命之旅 [J]. 外语学刊, 2017 (6): 122-126.
- [11]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复杂性思想的复杂适应系统阐释 [J]. 山东外语教学, 2021, 42 (3): 98-107.
- [12] 胡庚申. 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 (2): 125-131.
- [13] 胡庚申. 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 [J]. 中国翻译, 2019, 40 (4): 24-33.
- [14] 罗迪江. 译者研究的问题转换与生态定位: 生态翻译学视角 [J]. 中国翻译, 2020, 41 (5): 13-19.
- [15] 罗迪江. 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 生态翻译学视角 [J]. 中国翻译, 2019, 40 (4): 34-41.

- [16] 冯全功, 张慧玉. 绿色翻译: 内涵与表现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35 (1): 97-101.
- [17] 谭载喜. 译者比喻与译者身份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3 (3): 116-123.
- [18] 刘满芸. 共生理论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J]. 中国翻译, 2016, 37 (3): 20-25.
- [19] 吕俊. 开展翻译学的复杂性研究: 一个译学研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 [J]. 上海翻译, 2013 (1): 1-6.
- [20] 刘云虹. 翻译定位与翻译成长性: 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的多元系统论再思考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41 (4): 94-100.
- [21] 许钧. 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 (3): 1-5.
- [22]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绿色翻译的生态属性及价值取向探析 [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1 (6): 123-128.
- [23] 樊宏法, 沈灵娟.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规定探析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2 (3): 92-100.

The Thinking Structure and Question Field of Gree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Luo Dijiang

Abstract: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of translator survival, textual life and translation ecology becom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understanding green translation. Survival thinking, life thinking and ecological thinking form the thinking structure of green translation. And “why to become green”, “can it become green” and “how to become green” constitute the question field of “green questions” for green translation. Based on its thinking structure and question field, green translation is the ecological translation with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of “translator-text-ecosystem”. Specifically speaking, green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lator’s action of textual transplantation oriented by the thinking paradigm of “survival-life-ecology”, by means of green concept to aim at the birth, extension and growth of textual life in the new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green translation; ecological thinking; translational ecology; harmonious symbiosis

(收稿日期: 2021-09-11; 责任编辑: 陈鸿)